

CHINA

# 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

陈其泰 张京华 主编



京华出版社

# 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

(1949—2000)

陈其泰 张京华 主编

京华出版社



## 编选例言

一、顾颉刚在“五四”时期以提倡大胆疑古辨伪著名，吸引了其他学者参加，形成了以他为主将的“古史辨派”，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1926年，他将围绕其疑古观点进行讨论的有关各方的文章、通信编成《古史辨》第1册，在北京出版，至1941年，一共出版了《古史辨》7册。由于这一疑古思潮对于20世纪学术史的进程影响巨大，因此，在1949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它始终引起学术界研究、评论的极大兴趣。许多学者著文，分别从应该如何评价“古史辨派”，这一疑古辨伪学派的学术特点，“古史辨派”与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疑古学者的治学方法及其得失等项加以评析，各抒己见。为了集中反映这一领域的学术遗产，全面分析、探讨“古史辨派”的成就与局限，并藉以从一个侧面反思20世纪的学术历程，我们特从近百篇文章中精选出41篇有代表性的论文，结集出版，以期为各方面的专家和广大读者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参考资料。

二、本讨论集主要选入大陆地区学者发表的论文及学术文章，同时从我们见到的台、港学者和国外学者的论著中选出最有代表性者。所选论文截止于2000年。

三、所选大陆地区学者的论文，按内容分为5辑编排：

- (1) 50年代对疑古思潮的评论；
- (2) 1981年以来总论性的论文；
- (3) 有关顾颉刚的生平和治学风格的论文；
- (4) 论疑古思潮与其他学术领域关系的论文；
- (5) 近年来论述“走出疑古时代”观点的论文。

第6辑是海外学者的论文。各辑文章的编排大致依发表时间或论文集出版时间之先后为序。

香港学者许冠三所著《新史学九十年》卷三之第二章《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虽不是单篇论文，但因其很有学术参考价值，故亦特予选入。

四、对于所选论文，编者只作技术性的处理。凡原文排为繁体的，一律改排简体；凡原文为夹注和尾注的，为方便阅读，一律改为脚注；凡文章刊载于多处，题目也有改换，但内容全同的，选取其中较为切当的题目。其他如标点及标题格式等，不作改变。

五、为保持学术文献的原貌，对所选文章之内容一仍其旧。如原刊文字或标点确有误排之处，均予改正。

陈其泰

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2000年8月25日

## 目 录

编选例言 .....	( 1 )
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	( 1 )
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	( 7 )
李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 .....	( 16 )
吴泽、袁英光：古史辨派史学思想批判 .....	( 51 )
吴泽：“五四”前后“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	( 64 )
杨向奎：论“古史辨派” .....	( 79 )
蔡尚思：顾颉刚创建的新疑古派——《古史辨》派作 用的具体分析.....	( 101 )
周春元：论古史辨派的史学.....	( 107 )
刘俐娜：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 124 )
赵光贤：顾颉刚与《古史辨》 .....	( 140 )
吴怀祺：近代新文化和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	( 158 )
胡新生：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 171 )
杨善群：论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 180 )
顾 洪：论古史辨学派产生的学术思想背景.....	( 191 )
王煦华：试论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	( 207 )
王树民：《古史辨》评议 .....	( 222 )
刘家 and：《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序 .....	( 244 )
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	( 253 )
白寿彝：怀念顾颉刚先生.....	( 270 )

杨 宽：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 .....	(277)
周明武：顾颉刚疑古辨伪所体现的学格人格略论 .....	(284)
胡 绳：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 先生诞生 100 周年 .....	(296)
刘起钎：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	(301)
杜蒸民：胡适与古史辨派 .....	(320)
徐中舒：经今古文问题综论 .....	(332)
汤志钧：《古史辨》和经今文——纪念顾颉刚先生 .....	(344)
余兼胜：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与其古今文经学认识 的关系 .....	(358)
王元化：与友人书：谈古史辨 .....	(369)
路新生：崔述与顾颉刚 .....	(373)
罗义俊：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 .....	(397)
张书学：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	(414)
李 庆：《崔东壁遗书》和二十世纪初中日两国的 “疑古”思潮 .....	(432)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	(444)
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 .....	(460)
宋 健：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	(468)
宋 健：酬“断代工程”初遂 .....	(480)
(台湾) 李 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 .....	(486)
(日本) 小仓芳彦：顾颉刚与日本 .....	(501)
(美国)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 .....	(512)
(香港) 许冠三：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 .....	(519)
(香港) 饶宗颐：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 .....	(551)
编选后记 .....	(560)

## “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

童书业

现在已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三年了，一切旧的不合理的东西都在批判改造。最近又展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史学工作者迎接这个运动，也应该展开自我批判，把自己的旧学术思想彻底澄清一下。解放以后，我曾好几次在学习讨论会上和报纸上批判了自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但所批判的几乎只限于我自己的东西，不曾对我过去所隶属的学派——疑古派的史学作过整个的检讨，这篇文章就是想试从根源上批判疑古派的史学，以消除史学上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一环；有不周到或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指正。

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疑古派最著名的领袖顾颉刚说：“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康有为——笔者）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七八页）。“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老实说，我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不过如此而已”（同上九五页）。顾颉刚所谓“西洋的史学方法”，实际上即指实验主义的史学方法，实验主义是讲“演变”的，它的“历史的方法”又唤做“祖孙的方法”，据说是：“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東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

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所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这种方法，粗看很像马列主义的史学方法，以致有位疑古派大师解放后还说：“胡适的实验主义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并没有什么两样。”其实这种理解是大错而特错的：实验主义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在本质上何尝有丝毫的相同点。要明白实验主义与辩证法的区别，须从根本理论说起：

实验主义固然讲“变”，但它的“变”是没有必然方向的，这世界所以变成这样而不变成那样，实验主义者认为只是偶然而不是必然，从这个理论来说，科学的研究就不可能，历史就都只是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这无异否定了历史科学，实验主义是一种反科学的不可知论，也就是一种反科学的唯心论；这是我们首先应该认识的。

疑古派史学者所讲的“演变”正是实验主义的：尧舜从天神变成人帝，变成圣人孝子，禹从神变成人，变成水利工程师，都只是偶然的“演变”或“伪造”，都只是少数人自由意志的安排。我们讲了几十年的古史，编著了厚厚的许多册书，除起了些消极的破坏作用外，对于古史真相何尝摸着边际，我们曾强辩说：“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所建设出来的“真古史”又在哪里呢？“破坏伪古史就是建设真古史”，这句话未免太不着实了罢，老实说：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是永远建设不起真古史来的。

历史科学的任务在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而不是在寻求些偶然事件，这本是极明显的道理，无奈疑古派的人们沉醉在实验主义的毒素里而不能自拔，以致看不见这极明显的道理，反说寻求社会法则的“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二二页）。疑古派认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

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同上）。疑古派以为自己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自己“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唯物史观者——笔者）的进行”（二三页）。这种话好像对唯物史观者贡献好意，其实都只是抗拒唯物史观的一种巧妙手段，上引文字的作者把历史学机械地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唯物史观统治，一部分归校勘学和考证学统治，以为校勘学和考证学是基础，而唯物史观是建筑，要等疑古派把“坚实基础”“准备好了，然后再请唯物史观者动手造建筑。疑古派说：“须待借助于我们的还请镇静地等待下去罢”（同上）。“镇静地等待”到什么时候呢？疑古派自己承认：“得到结论不知在何年”？这就是说现在还是我们的天下，你们的天下还早呢，这不是“阻碍了”唯物史观者“的进行”是什么！疑古派又说：“如果等待不及，请你们自己起来干罢”（同上）！这就是说你们也来干校勘学和考证学罢，不要再谈唯物史观了，也就是说古代思想及制度不必研究（因为研究这些就“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现在只须“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就够了，请问提倡这种史学的“效果”是什么呢？

如所周知：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的史观，唯物史观的抬头就是无产阶级的抬头，而无产阶级的抬头是资产阶级所最怕的，所以他们想尽方法要把它压下去，要压制无产阶级，就不得不压制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就必然反对唯物史观，但是反对的方法不必一致：或者尽情诋毁，或者托词抗拒，或者截取变质；而这三种方法我们这批人之中就都用过的。

实验主义的方法除了讲无定向的“演变”之外，它的另一个特征是讲“实验”。“实验的方法”是“（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

的唯一试金石（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这段话从表面看来，也好像没有什么毛病，其实所谓“实验”就是测验对自己有无用处，胡适说：“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人的一种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实验主义）。这就是说“真理”即是“适用”的别名，如果“不适用”就决不是“真理”；“真理”是会变的，今天是“真理”，明天不一定仍是真理；“真理”只产生于人类的主观，并不存在于客观的世界中。照这个理论来说：孔子存在于春秋时代，只是因为这个“假设”对于我们有用，如果对于我们没用，则孔子就不存在于春秋时代了。胡适说他的史学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就是假设对于他有用，“求证”就是求证明对于他确实有用；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拆穿西洋镜，不过如此。

明白了实验主义者的“实验”方法，就能明白疑古派史学方法的真相了，疑古派的祖师胡适在五四文化运动时否认了三皇五帝和夏禹等，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些自然是那时他们的“真理”，因为对他们是有用的（证明人类有历史以来就是阶级社会）。到了后来，时代变了，“疑古”对于自己无用了（封建偶像不可推翻），就一反“疑古”而为“信古”，变成了“宁信古而失之，不可疑古而失之”：胡适确是实践了自己的实验主义的（顾颉刚据说发表过考证大禹王生日的文字，有人说这篇文字并不是他写的，但他不曾公开严厉驳斥，至少疑古精神是大大降落了，自然：“疑古”精神的逐渐降落，在“疑古”派中并不止他一人）。

“疑古派”的“疑古”精神在某些时候是勇敢的，是打击了些封建偶像和“圣经贤传”的（尤其是钱玄同的工作），可是所用的方法却颇不科学（因为实验主义本来不科学），我们过去往往把某些古书里没有这个人这一点作为历史上没有这个人的唯一证据，这是极危险的“默证法”。同时我们发现某部书里开始有这个人，就

把这个人认为与这部书同时出现的人物，这也是极危险的“假定法”。至于我们发现了与我们说法相反的证据时，又往往不惜袭用清末文学家的办法，武断说这证据是后人伪窜进古书去的：这种方法连本派某些人也常常提出异议。

我们且看看疑古派最有名的理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顾颉刚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古史辨第一册六〇页）。古代的历史许多是神话，这自然是事实，但这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古史的通例，稍有世界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的。对于中国古史的辨伪工作，只有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去观察，才能完成任务；用社会发展史眼光观察中国的古典，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古史传说多半是神话，但这神话中却有史影存在着，从神话里可以寻出历史的要素来。在唯物辩证法这面宝镜照临之下，我们可以去伪存真，化无用为有用：这才是研究中国古史最正当的方法；对古史传说一味抹煞，决不是科学的态度。疑古派只是把古史传说本身的发展过程，片面叙述出来，这至多只是神话学或民俗学的研究，而不是古史学的科学研究。

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这是最初的用意。此种意图表现在摧毁封建的圣经贤传（辨伪经）和封建的道统偶像（辨伪史），同时否认原始共产社会。后来这派的史学家多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了，这表现在“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据精神的加强，同时诋毁或不睬唯物史观。

疑古派这种转变，是与近代史的发展相适合的：当五四运动

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得到有限的发展，所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比较活跃，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展开反封建的文化运动，“疑古”的史学就是这种运动中后起的一环，它的反封建性是时代所赋予的。到五四运动后，西方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加紧侵略中国，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意识就大为低落，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便与封建势力妥协或投降了封建势力，这就形成疑古派史学（资产阶级的史学）的转变现象：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疑古派史学的发展史上也可充分看出。

有位过去曾赞同疑古派的先生说：某些新史学家“对于旧文献的批判根本没有做够，不仅古史辨派的阶段没有充分达到，甚至有时比康有为阎百诗都要落后，这样怎么能够扬弃旧史学呢？实在是应该成为问题的”，我们认为这段话是错误的，因为“古史辨派”（疑古派的别名）与康有为根本就不能与阎百诗相提并论。阎百诗是位比较单纯的考据家，而“古史辨派”与康有为并不是单纯的考据家。阎百诗的考据是可以供参考的，而“古史辨派”与康有为的作品，在考据学上说，也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并不是说新史学不需要考据，但是新史学所需要的考据，是唯物辩证法所掌握的考据，或者用唯物辩证法处理过的旧日纯考据家的成绩（如所谓“乾嘉学派”的成绩）。“古史辨派”和康有为的作品中可采的考据实在太少了。

我的结论是：当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是要肃清封建思想和改造资产阶级意识，疑古派的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正是应改造的对象之一，同志们赶快起来改造自己罢！

（原刊《文史哲》1952年第3期）

# “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

杨向奎

## (一)

所谓“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主要是指着顾颉刚教授的学术思想而言，在晚近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内，顾颉刚教授的学术思想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经直接和间接地引导着一部分青年走向他曾经走过的路。顾颉刚教授曾经编著了四册的“古史辨”（一、二、三、五），亲手编辑过歌谣周刊、禹贡半月刊、责善半月刊和文史杂志，他还亲手写过汉代学术史略，更和别人合写过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等书。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校任过教授。我们不管他的学术思想的价值如何，他曾经发生过影响是肯定的。过去发生过影响的东西，我们就应当加以分析批判，使不好的影响可以及时清除。

顾颉刚教授治学的方面相当广，他治过民俗学，民间歌谣，中国古代地理，以及中国古代史等，最主要的还是古史学和经学。他不愿意人家称道他是“经师”，而喜欢说自己是史学家，事实上他是“通经治史”，走的是“公羊学派”的老路，并不是干干脆脆的史学家。如今我批判他也就这一方面来说，因为这是他学术思想的主流，另一方面已经有童书业教授在批判了。公羊学派的大师在西汉是董仲舒，董仲舒代表着地主商人阶层的利益，承袭着孟子和荀子两家的学说，一只手提着五行说，一只手提着三统说，五行说是历史循环论的主持者，三统说是改良主义的法宝。西汉到刘彻的时代，在内在外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在内是地主和农民间的矛盾加深，在外是匈奴族的不断入侵，为了缓和这内部的阶级矛盾，董仲

舒要刘彻在政治上有所改革，这改革的方向，就是“以复古作维新”，“复古”是他的历史循环论，“维新”是他的改良主义，对外他提倡着大一统说而作削平匈奴的鼓吹。“公羊派”在整个的儒家思想上说是起着改良主义的作用的，所谓“改良”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一滴一点的改良，以维持原来统治阶级的寿命。到晚清时代康有为等又曾经打着“公羊派”的旗帜作改良主义的活动。虽然这时《公羊学派》的内容和董仲舒的时代有所不同了，但仍然是打着《公羊派》的幌子，康有为根据“公羊派”的说法，以为古代有所谓“三世”的说法，有“大同世”，有“小康世”，有“据乱世”，但他也说明这不是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不过是孔子的“托古改制”。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内说：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为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当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

康有为以为孔子以前的中国历史是“茫昧无稽”的，所有孔子以前的历史传说，是由于先秦诸子的托古改制。他的策略，“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后第二步说孔子托古作六经以改制，更进而为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为先例”。这是康有为的变法打算。董仲舒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所以他描绘了一个古代的黄金世界作为刘彻维新的张本，康有为的时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他代表着开明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把中国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也虚拟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作为转向的目标。“公羊派”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他们完全否定了中国古代史，说那是由于后人的创造，作为后人变法维新的张本。历史学本来是上层建筑，统治阶级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这也是统治阶级利用历史学为他本阶级服务的一个例证。

顾颉刚教授的疑古精神，是接受了“公羊学派”的法宝，这同时也说明着顾颉刚教授的思想还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开明地

主阶级的思想，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上，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比如：

果然，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味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意履理。

又说：

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

顾颉刚教授最初听了章太炎的讲学，很惊讶他的博学而看不起今文学派，及读了康有为的著作，又佩服他的学说而认为是惬意履理了。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遂有“推翻”古史的计划。古史而可以推翻，是极端唯心论的说法，这先假定古史是由于某些人主观地编造，所以某些人可以主观地把它推翻。

当然这一派的思想既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开明地主阶级的思想，所以它的渊源也并不单纯，他接受了公羊派的学说而有推翻古史的计划，接受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而有古史演变的主张，又接受了清代的考据学派的方法而对于古经古书发生怀疑，这三派学术思想的混合运用造成了他的怀疑古书，怀疑古史，推翻古史的疑古运动。

## (二)

顾颉刚教授的古史学说，前后有两个主要的课题：一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一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上一种说法是他的前期古史说的重点，下一种说法是他后期古史说的重点。由于他承袭了“诸子改制”的学说而怀疑古史；怀疑古史就追求这

种古史产生的原因，通过他主观唯心论的想法，他恍然大悟了，这些古史全是后人编造的，越造越长越远，是一塌糊涂，毫无是处的，这一种说法的影响所及，遂使许多人不敢讲中国古代史，只能讲“中华二千年史”了。顾颉刚教授说：

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看，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一种说法曾经被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称道为伟大的发现。有此发现，遂否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前的一切古史记载和传说，中国历史只有西周后才可信，西周以前的一切古史或者是伪造，或者是神话，全不能相信，他们说大禹是一条虫，尧舜是乌有先生。那末，中国社会是怎样发展得来的呢？中国社会有没有经过氏族社会，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这在古史辨派是不闻不问的，而且也不愿闻，也不知道问。只是专悍地说中国史自西周讲起，西周以前一切存疑，西周以前是一塌糊涂！

顾颉刚教授不承认他是作翻案的文章，他认为他已经掌握住客观真理，他已经认识到客观真实的古史，他说他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如疆域、信仰、学派、人才时代的中心问题等都是解决那时候的古史观念的最好的工具。”